

# 再發明與在行動

## ——化解人文學科世界性危機之路徑

周 憲

(南京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江蘇 南京 210093)



[摘要]在一個實用主義被膜拜和工具理性盛行的時代，人文學科常常被視為“無用之學”，人文學科危機的種種徵兆不斷顯現。人文學科所遭遇的世界性危機，既有外在原因，即科技主導的大趨勢以及目的（工具）理性的廣泛滲透；也有人文學科自身的原因，即沉湎於過去而未能對現代性作出敏銳回應。人文學者對這一危機的深切憂慮，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文知識生產及其職業的當下困境。在流動的現代性中，以傳統為導向的人文學科知識系統有必要實現某種現代轉換，發展出更有解釋力和親和力的新範式。而要從根本上化解人文學科的當下危機，關鍵並不在

於理論性討論，而在於行動和實踐的探索。首先，提倡一種“遊擊戰”的行動策略。通過人文學者與其他學科的學者建立起基於友誼基礎上的學術互動聯繫，使其他學科的學者把人文學科的基本理念和價值逐步滲透進各門學科的專業教育之中，在新的層面上重構人文學科知識生態系統。其次，“發明新傳統”。人文學科不能局限於課堂和校園，而應努力融入更為廣泛的社會實踐領域，形成一整套被公開或私下接受的規則所制約的實踐活動，通過不斷重複的儀式和象徵來傳遞特定價值和行為規範；即將大學人文學科所講授的那些價值，意義和理論等問題，轉化為一些精心設計的課外實踐活動或日常生活行為。最後，將書齋書本裏的高深理論轉化為街頭巷尾普及的知識。人文學科所傳達的思想、價值和倫理祇有被更多社會普通公眾接納、認可和敬重，人文學科纔能從危機走向復興。

[關鍵詞] 人文學科 人文教育 科技導向 價值理性 工具理性

[作者簡介]周憲（1954—），男，江蘇省南京市人，1998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2011年被評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為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院長、藝術研究院院長，兼任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江蘇省美學學會會長、江蘇省比較文學學會會長，主要從事美學、文學理論、文化和審美現代性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美學是什麼？》、《20世紀西方美學》、《審美現代性批判》、《視覺文化的轉向》等。

# Re-inventions and Actions: Ways for Resolving the Global Crises of Humanities

**Zhou X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10093)

**Abstract:** In the era of pragmatism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umanities are often regarded as “knowledge of no use”, and various signs of crises in humanities continue to appear. Humanities encounter worldwide crises for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asons.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technology-driven trends and the dominanc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ternally, dwelling on the past means failure to offer sensitive responses to the modern world. The deep concern of the humanists, to a certain extent, reveals a present-day dilemma betwee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profession of the humanists. As regards modernity in motion, the tradition-orientated humanities have to create a new paradigm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crises.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key is practical action, but not theoretical discussion. Firstly, an action strategy of “guerrilla war” is recommended. By means of academic interactions among scholar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basic concept and values of humanities will gradually penetrate into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a new eco-system of humanities knowledge in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will be re-constructed with a new dimension. Secondly, there should be an “invention of a new tradition.” Humanities should not be taught only on campus, but rather they should strive to be assimilated into a broader field of social practices and form a whole set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governed by rules acceptable to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 specific values and behavioral norms should be conveyed by repeatedly presenting the relevant rituals and symbols in those practical activities. Finally, Knowledge learned from college should be made popular and practical for the masses. The ideas, values and ethics transmitted by humanities will then be accepted, recognized and respected by the common people; and humanities would turn from crises to a renaissance.

**Keywords:** humanities; humanist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orientation; value rationalit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uthor:** **Zhou Xian** earned his PhD in literature at Nanjing University in 1988, and was appointe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Changjiang-Scholar Program”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in 2011. Currently he is a doctoral supervisor,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Dean of the Art Institute at Nanjing University.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aesthetics, literary theory, culture and aesthetic modernity. His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are *What is Aesthetics?*, *Western Aesthetics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Critique of Aesthetic Modernity*, and *The Turn of Visual Culture*, etc.

人文學科<sup>①</sup>的危機由來已久。一個多世紀以來，在西方，對這一危機的憂慮像幽靈一般出沒於學術界；在當今中國，隨着高速現代化和知識生產的爆炸性發展，各種學科建制、科研基金、學術會議、專業出版物蔚為大觀，人文學科為何並如何的問題也在呈現出來——在一個實用主義被膜拜和工具理性盛行的時代，人文學科常常被視為“無用之學”，人文學科危機的種種徵兆不斷顯現。遺憾的是，這一問題並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關注。事實上，在人文學科呈現危機的同時，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危機——整個社會的道德危機已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儘管從學術層面還不能簡單地得出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但它們之間的相關性是顯而易見的。2007年，哈佛大學前校長博克（Derek Curtis Bok）在學生畢業典禮致辭中說了這樣一番話：

大學該如何培育和激發人文學科呢？今天，人文學者常常感到被忽略，不為人們所賞識。……未來一些年，由於更強調科學而使得人文學者深感被邊緣化了，這很容易加劇他們的緊張。事情本不該如此。科學新發展的方式有可能延長人的生命，或摧毀人的生命，或人為地改變人的生命，這些方式開始被質疑為人之意義何在。人文學科傳統的核心問題是指向價值、意義和倫理，面對這樣的前景，此類問題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為了不再讓人文學科邊緣化，大學必須以我們都明白的方式來探尋如何激勵人文學者討論這些問題，以便他們能夠幫助我們建構一個這樣的世界。<sup>②</sup>

反觀當下的中國，同樣的問題也在困擾着中國的人文教育和知識生產。前所未有的科技導向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知識和教育的生態：一方面是科技實用理性的極度膨脹，科學研究和教育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則是人文學科在虛假繁榮背後的萎縮和困頓，社會道德全面滑坡，似乎正在邁向“失去靈魂的卓越”<sup>③</sup>！本文並不想全面討論人文學科的危機問題，而是想通過下面三個問題的探究，把中國問題置於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來解析。

### 問題一：誰在意人文學科的危機？

關於“誰在意人文學科的危機”問題，在不少人看來是明知故問，因為祇有人文學者纔會在意人文學科的危機。其實，潛藏在該問題背後的系列問題是：為什麼談論人文學科危機的總是人文學者？其他學科的學者為何對此無動於衷？談論這一問題是不是人文學者自身職業危機的表徵？

要解答這些問題，首先得從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差別說起。

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似乎是兩種全然不同的人，而科學與人文學科亦是一家歡喜一家愁。深諳兩個領域的英國學者斯諾（C. P. Snow, 1905—1980）在20世紀中葉提出了“兩種文化”的概念，藉此形象地描繪人文學者與科學家的天壤之別。斯諾認為，這兩種人生活在兩個全然不同的世界裏，他們“無論是在智力、道德或心理狀態方面都很少共同性”，中間隔着一個公開的“海洋”。<sup>④</sup>他們互不瞭解並且歪曲對方，甚至相互憎恨和厭惡；他們不但對待問題的態度全然不同，而且情感方面也毫無共同之處。<sup>⑤</sup>人文學者以文學知識分子（作家）為代表，科學家則以物理學家為典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作為一個現

① 我主張使用“人文學科”而不是“人文科學”概念，因為這一領域與自然科學或技術科學截然不同，並不具備嚴格科學意義上的學科性和研究範式，顯然不屬於“科學”之列，充其量只能稱之為“學科”。在西語中，相關的術語很多而且充滿歧義，如英文中的“humanities”，法文中的“sciences humaines”，德文中的“Geisteswissenschaften”等。

② “Remarks of President Derek Bok”, Harvard Gazette, 2007. <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07/06/remarks-of-president-derek-bok/>

③ 這一提法源自哈佛大學哈佛學院前院長哈里·路易斯（Harry Lewis）抨擊當代大學教育時弊的一本書《失去靈魂的卓越：人文教育還有未來嗎？》（*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Does Liberal Education has a Futur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6）。

④⑤ [英]斯諾：《兩種文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紀樹立譯，第2、4頁。

代化的後發國家，在大力提倡科學救國的導向中，人文學者與科學家之間的誤解、拒斥和偏見更是突出，人文學者缺乏科學常識、科學家缺乏人文修養也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這一糟糕的學科間關係，導致了中國人文學科及其教育更加窘迫的境況，同時又更容易產生科學宰製的局面。在今天中國的大學裏，科學家們顯然沒有職業的危機感，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研究無論在經費、機遇、求職，還是在聲望、象徵資本、社會認可上，都遠優於人文學者。人文學者淪為二流“勞心者”，已是不爭的事實！

如果說斯諾的分析祇是對人文學科與科學關係現象描述的話，那麼，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 Weber, 1864—1920）早在20世紀初就揭示了現代社會根深蒂固的衝突，那就是目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緊張，它與此處討論的問題密切相關。韋伯認為，現代社會存在着兩種理性行爲，其一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爲，即通過對外界事物的情況和其他人的舉止的期待，並利用這種期待作為“條件”或者作為“手段”，以期實現自己合乎理性所爭取和考慮的作為成果的目的；其二是價值合乎理性的行爲，即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舉止的——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sup>①</sup>韋伯特別強調指出，價值理性與目的（工具）理性處在複雜的關係之中。如果從目的理性角度看，價值理性總是“非理性的”，因為它越是考慮行爲的固有價值（純粹的思想意識、美、絕對的善、絕對的義務），就會越是不顧行爲的後果。

照理說，無論是人文學科還是其他學科，價值理性本應成為一切科學研究的內在根據。然而，隨着社會和科學研究活動的發展，現代社會佔據主導地位的是目的（工具）理性，它與價值理性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知識生產在科技導向下逐漸遠離價值理性。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曾用言簡意賅的語言描述了韋伯所說的工具理性，就是人們計算着以最經濟的手段用於特定目標的合理性，就是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效益的最大化。<sup>②</sup>如果以泰勒的說法來反觀當今的學術研究和大學教育，不難發現，目的（工具）理性已經深蘊在各種科學和技術活動中，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也在所難免，種種學風、抄襲和造假問題，不妨視作目的（工具）理性畸形膨脹的惡果。這大概就是哈里·路易斯所說的“失去靈魂的卓越”的表現，也就是價值理性失落的表徵。順着韋伯的思路來看，有一個現象是令人深思的，那就是在科學研究中，價值、意義和倫理問題會經常性地缺失。因為，科學往往是價值中立的，通常服務於某種現實的、功利性的目標，那種出於純粹興趣、愛好、信念的學術研究，面對今天中國高度工具理性化的現實，已無安身立命之處。有趣的是，作為“無用之學”的人文學科及人文學者，卻常有一種源自內心的衝動，那就是關注、強調和捍衛價值理性，堅守生活世界和知識生產中的價值、意義和倫理。面對社會行爲和科學活動中目的（工具）理性的不斷擴張，人們對價值理性及其行爲的社會共識和普遍認同不斷下降，人文學者的內心憂慮必然會與日俱增。

問題的嚴峻性還在於，當目的（工具）理性成為人們行爲普遍傾向時，當價值理性被人們邊緣化時，科學及其相關學科成為當今知識生產和教育的絕對主導傾向時，它的爆炸性擴張持續地侵蝕着人文學科曾經佔據的地盤，使人文學科的生存空間明顯萎縮。許多年以來，北美和歐洲的大學出現了人文學科經費銳減、教職削減、學生數下降的明顯趨勢。一旦學校出現財政危機，首先關門的當是人文學科。這種“科學帝國主義”影響不可小覷，雖然中國大學人文學科目前並未出現顯著的萎縮，但相信這個趨向的出現不是杞人憂天。不僅如此，“科學帝國主義”的影響還體現在其研究範式的擴張上。19世紀以來，科

① [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林榮遠譯，上卷，第56頁。

② [加拿大]查爾斯·泰勒：《現代性的隱憂》（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程煉譯，第5頁。

學的昌明使其研究范式對人文學科產生了複雜的影響。曾幾何時，人文學者效仿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以精密科學的範式來改造人文學科，較典型的如美學中的科學美學、實驗美學，英美新批評對文學研究科學性論證，藝術心理學對實驗和數據的倚重等；改革開放以來，文學研究中曾熱鬧一時的“三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模式等，都可以視作這個趨向的反映。今天，雖然來自科學範式的誘惑和壓力大不如前，但人文學科研究常常被批評過於主觀而缺乏科學性，社會科學也以其更趨向於經驗的、統計學的、模型化的範式而迥異於人文學科。曾幾何時，哲學被稱為一切科學之母，在古典時期，哲學家是智慧超群的思想家；現如今，從事哲學研究不過是在教育或研究機構中謀一職位而已。更讓人不安的是，在當下中國，最聰慧的學生都奔着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去了——未來就業的收入決定了專業的冷熱。選擇人文學科通常不是出於無奈，便是高考時的“被服從”。

種種不妙的發展趨向似乎在向人們昭示，人文學科的職業危機正在慢慢逼近。就像傳統手工藝在機器大工業時代有落伍之感而產生危機一樣，人文學者在當下大學高等教育中感悟到了揮之不去的生存危機。他們收入低並且求職難，與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的學者們經費足、職位多並且頤指氣使的情形形成鮮明對照。人文學者更像是傳統手工藝作坊裏的師傅，不但要忙乎自己的研究，還要為學生修改論文、推薦發表或尋找工作。雖不能說人文學科已是“夕陽產業”，但它處境艱難是顯而易見的。由是觀之，人文學者熱衷於談論人文學科的危機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是他們面對自己職業危機的必然反應。這是可以得出的第一個結論。

## 問題二：人文學科屬於過時的傳統型知識嗎？

較之於科學技術總是面向未來提出新問題和新理論，人文學科似乎更偏向於回歸傳統和過去。不同於科學知識的日新月異，人文學科的問題看起來總是一副老面孔。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T. S. Kuhn, 1922—1996）認為，科學沒有歷史，因為新知識一旦出現便把舊知識扔進了歷史的垃圾箱；更重要的是，科學總是追求唯一正確的答案，而藝術和人文學科中則充滿了爭議和歧見。所以，科學的發展具有替代性，新發現替代了舊結論；但藝術則不然，後來的藝術家不論多麼偉大，他們都無法取代以前的藝術家。正是這個緣故，人們今天仍然欣賞過去的藝術傑作，仍閱讀孔、孟、老、莊的經典，仍喜愛屈原（約342—前278）、陶潛（約365—427）、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曹雪芹（1715—1763）的作品。有趣的是，今天學習物理學的人不會再去閱讀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的《物理學》，也不會從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關於電的正負極辯證法中獲得關於電的知識，因為科學與哲學的分家使得早期哲學著述不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價值了，但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和黑格爾的《邏輯學》仍是後人爭相閱讀的對象。庫恩的結論是：“藝術家認為是目的的東西，在科學家看來卻是手段，反之亦然。”<sup>①</sup>於是他斷言：畢加索（P. Picasso, 1881—1973）的成功不會把倫勃朗（R. H. V. Rijn, 1606—1669）擠進博物館的儲藏室，但科學的新發現卻使以前的重要著作過時了，“與藝術不同，科學毀滅自己的過去”。<sup>②</sup>由此，人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不同於科學的未來導向，人文學科的傳統導向與不斷發展的現代性進程有何關聯？在一個愈加“流動（液態）現代性”的社會和知識系統中，人文學科的古典知識何以有效地解釋當下？

平心而論，人文學科今天所遭遇的危機，既有外在的原因，比如科技主導的大趨勢

①② [美]托瑪斯·庫恩：《必要的張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紀樹立等譯，第338、340頁。

以及目的（工具）理性的廣泛滲透；也有人文學科自身的原因，那就是它沉湎於過去而未能對現代性作出敏銳的回應。根據通常的看法，人文學科涉及的是價值、意義和倫理。而無論是西方的古典學研究還是中國的國學研究，其基本學理根據都是傳統及其價值、意義和倫理。如果說價值、意義和倫理是內容層面的某種規定的話，那麼，它的形式層面則呈現為人文學科知識的基本載體——文本。用美國國家人文中心主任哈芬（Geoffrey Galt Harpham）的話來說，人文學科就是“對人們在過去所產生的文獻和作品的學理性研究，這一研究可以使我們從不同的視角來看世界，進而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們自身”<sup>①</sup>。他認為，人文學科研究概括起來有三個關鍵詞：“文本性”（textuality）；“人文”（人道，或人性，humanity）；“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文本性”所涉及的就是過去所留存下來的各種歷史文獻，從中國古代文學到哲學、史學、藝術等，不一而足。哈芬的看法是，文本性具有某種顯著地指向過去的傾向，“主要現象就是過去性：如一些作者所言，人文學科獨特的‘精神轉向’是‘指向歷史’”。<sup>②</sup>本來，指向過去無可厚非，因為人文學科的研究免不了要歷史化、語境化。但問題在於，面對不斷激變的現代性發展，面對科學知識爆炸性地突進，恪守傳統的種種學術理路是否能適應於這一“劇變”（波蘭尼語，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呢？思想家們早已清晰地描繪了現代性的“液態”特徵<sup>③</sup>，“一切堅實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馬克思），現代性就是“短暫、過渡和偶然”（波德萊爾）。於是，埋首故紙堆式學究路徑顯然已難以解釋“流動的現代性”。因此，對人文學科的“再發明”就變得刻不容緩。遺憾的是，在人文學科內部，埋首故紙堆或“以古釋古”的學究氣仍很有市場。這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學科的現代性轉型，削弱了它對新的社會文化現實的解釋力。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在當代知識體系中，人文學科對青年學子的吸引力越來越微弱，這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人文學科在當代知識體系中的“合法性危機”。值得注意的是，當今關於人文學科的重要性的必要性的論證可謂汗牛充棟，但這些論證似乎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文學科發展的頹勢。於是人們不得不追問，是不是人文學科本身的局限使之無法在科學獨霸的時代再現輝煌呢？

回到哈芬對人文學科的三個關鍵詞上來，除了與古典傳統關係密切的“文本性”之外，另外兩個概念——“人文”和“自我理解”顯然是更重要的範疇。“文本性”與後兩個關鍵詞關係複雜，正是通過“文本性”的現代闡釋，“人文”的古典含義纔能實現向現代性的轉變，轉而成爲一個具有現代效力的範疇。通常所說的人文學科恪守價值、意義和倫理，就體現在“人文”概念的現代詮釋之中。進一步，正是通過這樣的“人文”概念的闡釋，纔能形成人們現代意義的“自我理解”。所以，人文教育不同於科學和技術的教育，它更關乎人的公民性培育，是對一個健康社會中合格公民的價值理性之培育。

可喜的是，近年來人文學科出現了一系列值得關注的發展。這些發展，一方面回應了對其合法性的質疑，另一方面也極大地拓展了人文學科的視野和方法。比如，傳統的“文本性”概念已經不再局限於古代書寫或印刷文本，諸如視覺符號、城市空間、虛擬實境等諸多新的載體已經進入人文研究領域。尤其是所謂“數字人文學科”（電子人文學科，digital humanities）的崛起，它不祇是人文學科研究的電子化，更是人文學科新思路和新空間的開拓。從數據採擷到信息視覺化，從地理空間分析到多媒體甚至全媒體，載體形式的變化也在促使研究內容和觀念的變化，新的方法和理念被融入了數字化的人文資源，進而帶來對古典傳統的全新解釋和理解。有學者樂觀地評價道：數字人文學科的出現，不

<sup>①②</sup> Geoffrey Galt Harpham, "Beneath and beyond the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 *New Literary History* 1(2005): 23.

<sup>③</sup> [英]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歐陽景根譯。

僅帶來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教育，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人文學科的學術生態系統。正在形成的數字人文學科共同體具有某種潛能和責任：堅持人文學科的立場和主張，將數字技術創造性地用於提升人文學科的研究和教學。<sup>①</sup>

近年來人文學科發展的另一個趨向是跨學科研究的興起。其實，人文學科的古典知識形態並沒有嚴格的學科界限，文、史、哲不分家在過去是司空見慣的。祇是由於現代性的知識和學科的分化導致了人文學科的專業分工，一個個互不相干的獨立領域遂成家立業起來。祇要把“五四”時期的文史大家和當下學者的研究稍加比較，就不難發現，這一百年來中國的人文知識生產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跨學科的人文學科知識生產具有兩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正像一些人文學者指出的那樣，在當代知識系統中，人文學科的任一具體學科都祇具有部分人文學科性，無論哲學、歷史、文學、藝術或修辭學等，它們往往祇是人文學科整體價值、意義和倫理的某個局部領域的探索。比如，修辭學關於自我表達和交往能力的訓練，文學關於想象力和生命意義的探尋，哲學關於形而上學的論證或公正等倫理探究等。因此，把這些分別進行的研究和教育整合起來，那將有助於培育學生們完整的自我理解系統，進而克服個別的或零散的自我理解。<sup>②</sup>其二，在當代龐大的知識系統中，人文學科若要獲得長足的進步，努力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甚至技術科學融通互動乃是必然趨勢。儘管人文學科與科學有着諸多的根本性不同，但正是這些差異導致了人文學科有可能和有必要引入新的學科資源，進而改變人文學科給人保守、刻板、過時的面孔。當代社會所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遠不是某一學科可以單獨解決的，這就為人文學科的廣泛參與提供了新的契機。從生命科學中的生命倫理問題，到環境研究的歷史和人文層面，再到許多社會問題的探究（性別研究、教育研究、心理學研究、決策研究、公共政策、國際關係、政府治理、商業道德、城市文化等等），如果沒有人文學科的深度有效參與，將是難以徹底解決的。正是在這裏，人文學科可以派上大用場。跨學科研究不僅是對傳統人文學科知識形態的改造，也是對傳統人文學者角色和知識功能的重構。

至此，可以得出第二個可能的結論是，人文學科的傳統性與現代性是可以對接和轉換的，關鍵在於如何防止人文學科在當代被“博物館化”；如果能把“保留曲目”轉化為“新曲目”，那將有助於實現人文學科在現代知識系統中的合法化證明。

### 問題三：如何復興當代人文學科？

縱觀整個20世紀，西方學術界關於人文學科危機與復興的爭論不絕於耳，但令人氣餒的是，這些討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文學科的困窘。歷史的比較常常是人們把握當下問題的門徑，西方啓蒙時期與中國“五四”時期可作為思索當下困境的兩個參照點。在啓蒙時期，法國社會總人口中識字率祇有37%，但那時，啓蒙思想家們所提倡的人文主義、人文學科和人文價值的社會認可，具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共識。“五四”時期的中國，文盲率遠遠高於法國啓蒙時期，但一大批思想家和文人提倡新學，強調中國古代思想反思批判基礎上的轉型，提出了一系列有影響的人文主義啓蒙命題，也得到了當時社會各界的廣泛回應和認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今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識字率大大提高了，教育普及率遠遠超越了過去，受教育或有教養的公眾已成為或將成為社會的主體，但今天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學科似乎更加凋零，人文價值、意義和倫理卻倍受冷落。原因何在？哈里·路易斯“失去靈魂的卓越”這個概括，也許道出了某些原委：

<sup>①</sup> Mathew K. Gold,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ix.

<sup>②</sup> Richard Wolin, “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in Humanities”, *The Hedgehog Review* (Summer, 2011), 15.

大學已忘卻了它對大學生應有的更大目標。大學作為知識的創造者和儲存者是成功的，甚至比過去更成功。然而，大學卻忘記了本科生教育的基本任務，乃是使18—19歲的青少年成長為21—22歲的青年人，幫助他們成長，讓他們知道自己是誰，為自己生活去探尋更大的目標，離開學校時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對學術上卓越的追求已完全遮蔽了大學的作用，以至於大學已忘了需要去協調好這兩者。一些以教學獎和學生公共服務計劃形式出現的教育活動是徒有其名。有些教授顯得是道德正直的名師楷模。細讀一下任何一所大學領導的致辭，你都會發現充滿了關於世界問題、知識探求、努力工作和成功的言辭，但你卻很少聽到有關人格力量、正直、友善、合作、同情心以及如何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好的言論。大學越是卓越，就越想在師資、學生和研究經費的市場上獲得有競爭力的成功。但它卻很少對學生嚴肅地談論如何把自己培養成有良好人格的人，讓他們明白正是由於自己接受了良好教育，所以應努力回饋社會。<sup>①</sup>

其實，這是全世界許多大學正在發生的情況——大學教育在追求卓越的同時，卻失去了精神、心靈和倫理。這個問題在當下的中國大學顯得尤為突出，不僅存在着“失去靈魂的卓越”，更可怕的是還存在着“缺乏人文精神的平庸”。“羨慕、嫉妒、恨”這一網絡流行語，折射出大學社區和知識共同體的真實危境；校園裏頻頻發生的惡性案件不啻像警鐘提醒人們，人文學科及其人文教育必須以切實的行動來改變這一危險的發展方向！

面對當代人文學科的世界性危機，重要的已不再是理論上的論證，而是要努力探究某種更具實踐性的行動。換言之，化解人文學科的世界性危機與其說是一個理論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向實踐轉換的問題。如果需要提出一個口號的話，那就是：“人文學科在行動。”

首先，人文學科及其教育要想獲得更大的空間和影響，就要與其他學科有效結合。目前，大學裏的人文學科教育大致有兩種路徑：一是人文學科的專業教育。它基本上屬於精英式的少數人的專業教育，因而其局限性較為明顯。二是通識教育課程中的人文學科課程。來自其他專業的學生，大多是以應付的態度來修此類課程。因此，可以斷言，目前大學教育中的人文學科教育並沒有取得實際的功效。要想從根本上改變人文學科教育的困境，可能的路徑是，將人文學科的資源擴展到其他專業教育。即提倡一種“遊擊戰”的行動策略，通過人文學者各種交結和關聯，從私人間的交往，到各種制度性的聯誼活動，與其他學科的學者建立起基於友誼基礎上的學術互動聯繫，通過其他學科的學者把人文學科的基本理念和價值逐步滲透進各門學科的專業教育之中。事實上，改變人文學科困境的關鍵環節並不在於作為教育受眾的學生，而在於作為教育主體的教師。如果各專業的教師都具備了良好的人文學科素質，如果他們各自的專業課程都能蘊涵不同程度的人文價值、意義和倫理關懷，那麼，大學人文學科的教育便不再蜷縮在狹小領域成為少數人的志業，而是具有廣泛性和普遍性的公民教育。這樣，大學教育在追求卓越的同時，便不會失去“靈魂”了。人文學者如何深入到其他學科的“後方”而發動“遊擊戰”，如何把人文學科的教育轉化為其他專業教育中的有效資源，如何發展出與其他學科有效的合作模式，也許是人文學者需要深入探究的難題。斯諾曾坦言，人文學者與科學家彼此敵視，互相誤解對方；哈佛大學前校長博克希望，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應彼此協調。這些說法都表明，當今大學教育中人文學者與科學家之間學術交往與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是人文學者更多地瞭解科學知識，另一方面是科學家們更多地增加人文修養，一旦介於其間的“海洋”被跨越，跨學科研究的人文學科便真正行動起來了。例如，針對物理學或數學教學，如何

<sup>①</sup> Harry Lewis,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Does Liberal Education has a Future?* xii.



把一些重要的哲學形而上觀念貫穿進去；又如，針對生命科學研究，將生命倫理學的討論深入其內；再如，針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可以將人與自然及其環境倫理的討論暗含其中。理想的模式是，每門專業課程都有人文學者的參與，安排若干單元討論意義、價值和倫理等相關問題。如果人文學科走出原有的格局而進入其他學科領域，那它就在新的層面上重構了人文學科的知識生態系統。與科學家們合作，編寫出適合其他學科的人文學科教材，也是人文學科當下發展的一個任務。在有條件的情況下，人文學科的教師應與其他學科的教師合作，共同開設其他專業課程，實現人文學者與科學家之間的跨學科互動。

其次，實現人文學科教育從學理型向實踐型的轉向，需要“發明新傳統”。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 J. E. Hobsbawm, 1917—2012）的“傳統的發明”理論指出，當社會迅速轉型並且削弱了已有的傳統社會模式時，“傳統的發明”就會頻繁出現，進而形成了新的傳統。他認為，“被發明的傳統”是一整套被公開或私下接受的規則所控制的實踐活動，具有儀式或象徵的特性，通過不斷的實踐來將特定價值、行為規範潛移默化於主體之中。<sup>①</sup>霍布斯鮑姆強調“被發明的傳統”所具有的高度實踐性，對於如何改進人文學科研究和教育也頗有啟發性。要實現人文學科從學院傳統向社會實踐的轉變，就不能局限於課堂和校園，而應努力融入更為廣泛的社會實踐領域，形成霍布斯鮑姆所說的一整套被公開或私下接受的規則所制約的實踐活動，通過不斷重複的儀式和象徵來傳遞特定價值和行為規範。如果大學人文學科所講授的那些價值、意義和倫理等問題，能轉化為一些精心設計的課外實踐活動或日常生活行為，那麼，人文學科教育就可以從課堂轉向課外，從校園延伸到社會，從學術研究拓展到日常生活世界。例如，社會生活諸方面的倫理問題，可以通過老師和學生的廣泛參與的社會活動來加以討論；又如，環境倫理問題，也可以通過師生的具體環保活動來加以討論和深化；再如，中國傳統文化中博愛、尊老愛幼、濟弱扶貧、熱愛自然等傳統價值觀，可以借助一些儀式性和象徵性的實踐活動來耳濡目染。



智慧女神的貓頭鷹

最後，將書齋書本裏的高深理論轉化為街頭巷尾普及的知識。人文學科作為一種以傳統為導向的古典知識體系，是與傳統社會的閑暇生活及其節奏密切相關的，所以黑格爾說，“智慧女神的貓頭鷹”（the Owl of Minerva）總是在黃昏時起飛。這其實是對思想及其智慧條件的一個說明。今天，當人們過多地沉浸在工具理性的實務活動中，快節奏地忙於生計時，“貓頭鷹”是難以起飛的；而每當閑暇出現時，人們又耽溺於各式各樣放縱的娛樂活動中，“貓頭鷹”也不見了蹤影。面對這一困境，人文學者除了在書齋裏潛心研究和課堂上悉心教授學生之外，還可以把人文學科高深的知識轉化為大眾可以接受的普及的知識。歷史上有不少這樣成功的楷模，他們不但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裏成就卓著，而且在人文知識的普及上也做了許多讓人欽佩的推廣工作。這樣的普及型人文知識使得“智慧女神的貓頭鷹”並不是在黃昏纔起飛，而是可以成為人們終日的伴侶。人文學科所傳達的思想、價值和倫理為更多社會普通公眾所接納、認可和敬重，是人文學科從危機走向復興的必經之路。

如此說來，第三個問題得出的結論是：人文學科從學院化知識體系走向社會生活的實踐性，乃是當下復興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選項。

<sup>①</sup> 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and Ter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